



陇东革命斗争史

LONGDONG GEMING DOUZHENGSHI

马西林 王钊林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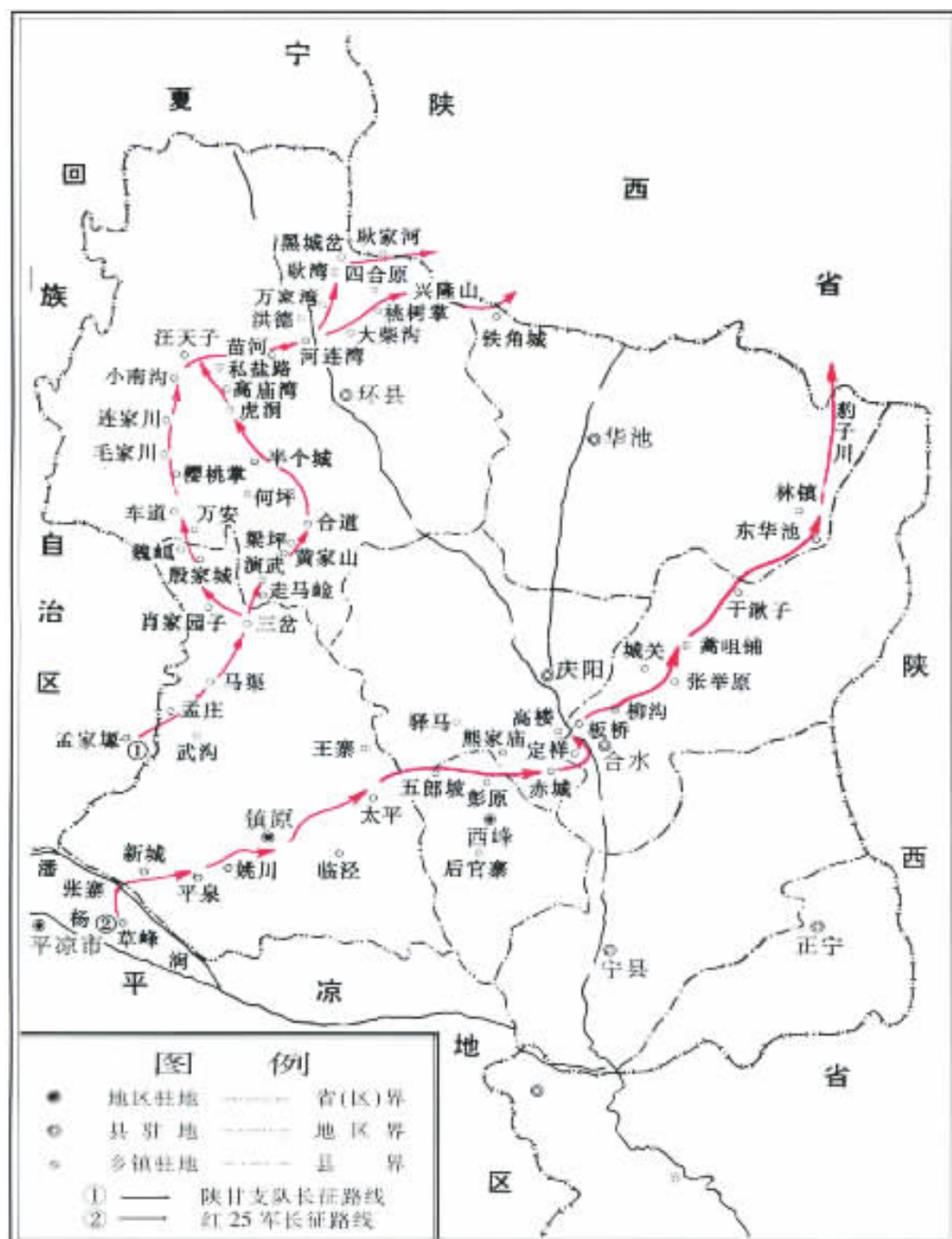
庆阳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及陇东国统中共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1937.9—19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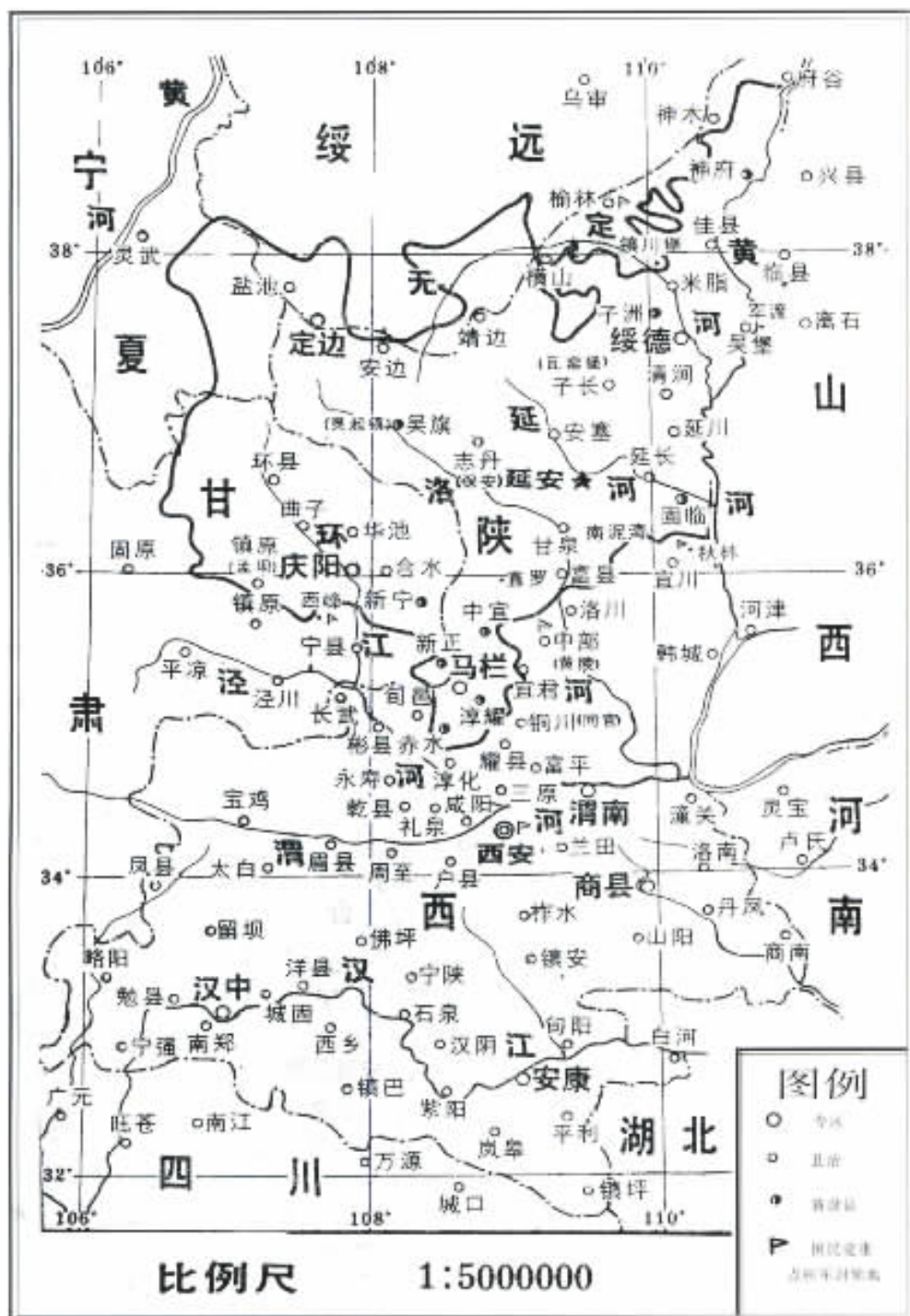
陕甘宁省、关中特区时期所辖陇东苏区示意图



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 第25军 长征过庆阳路线图



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图（1941年）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0.8—1945.8)



前 言

陇东革命斗争史，是庆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甘肃陇东这块黄土地上，为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历史。陇东革命斗争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是一条长河。掌握陇东革命斗争史，不能不了解悠久灿烂的庆阳历史。

庆阳位于甘肃省的最东端，习惯上称其为“陇东”。远在20万年以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狩猎和采集，我国的第一块旧石器，就出土于华池县赵家岔。庆阳为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活动的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夏商时这里属《禹贡》所列“九州”中的雍州之地。周时称北豳，先周首领不窋及其后裔鞠陶、公刘曾经长期在这里“务耕种，行地宜”，复兴周道，开创了中华民族早期的农耕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地属义渠戎国，秦代为北地郡。到了汉代，农牧业进一步发展，庆阳已是“沃野千里，民以富饶”的地方。隋代改置庆州，唐代沿袭，宋代始为庆阳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中华民国建立。1913年（民国2年），废除府制，庆阳归属陇东道；1927年（民国16年）废道，改属泾原行政区；1935年，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西峰设立。中国共产党领

修订说明

本书于1993年第一次出版的时候，著者在《后记》里就说过：“由于本书是关于庆阳老区革命斗争的第一本史书，也由于工作条件和水平所限，尽管大家抱有良好的愿望，做了认真负责的工作，但疏漏以至错讹之处肯定存在。为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计，恳请读者热心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这绝非套话。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疏漏和错讹”是“肯定”而不是“可能”存在。这话出自著者之口，原本表明两点：一是给读者以请求——注意发现问题，不吝提出指正；二是给我们加责任——注意吸收意见，适时修订本书。因为，著者有一个郑重的承诺：“为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计。”

春秋易逝，转瞬8年。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注意听取反映，而且主动征求过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同志的意见。其中，彭得琇、高文和曹清珂同志校阅了全书，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他们或在书上修改后将书送达我们，或者写长信陈述具体意见，提出商榷之处。这种难得的关心和认真负责精神令我们感动。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这次修订，对全书的纲目和体例不予改动，主要是对文字的订正和史实的校核。另外，还适当增补了一些内容。

文字的订正比较好办，错的和不准确的改过来就是了。但此

2 | 陇东革命斗争史

事极须仔细，因为这也关系到史实的准确与否。例如，原书第59页有一句是“红军攻战腊子口”，将“占”误印为“战”，就把占领说成了正在战斗，显然与事实相左。又如第69页有个括号内的文字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在“团”“红”二字之间少了一个“和”字，就造成了“红二十八军属于红十五军团”的误会，其实当时它们并无隶属关系。而第72页倒数第4行在“2”和“4”之间缺少一个小数点，当时的环县，人口就由2.4万变成了24万人，真乃大谬！此类差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真令我们负疚。本书初版的时候，由于经费和印刷条件所限，著者虽守在车间校对亦不能避免其误，实在让人遗憾。一个差错，就可能会给有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带来长时间的误导，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首先要负责任的。带着歉意，这次修订除我们反复订正外，还特聘了汉语讲师曹孝民先生在文字上把关，我们向他致谢。

史实的校核就比较费事了。我们的原则是，不论读者指出的还是不曾指出的，对全书史料一律再核实。这样，对有关数百万字的资料和图书几乎全部翻检了一次，不少反复查阅，互相印证。核查表明：本书初版本在史实方面尚无大的问题，某些有争议之处主要是史料的来源和对其看法的不同，需要进一步辨析和确认。陇东根据地时期的革命斗争相当错综复杂，由于严酷战争环境和巨大的物质困难，当时留下来的文字史料不多，相当多的史料来自大量的采访记录和回忆文章，搜集整理和鉴别考证的任务十分繁重。党史部门的同志们对此进行了长期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目前说法矛盾、看法不一、有待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而写史从来都不会在一切都有定论之后。所以，对现有资料的鉴别和确认，实属至关重要。这方面，我们的原则还是初版本《前言》中所说的“以目前看法基本一致的材料

为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是重正史而轻野史，重党史部门研究成果而轻采访回忆材料，重公开出版著述而轻内部印刷刊物。对一则有争议的史料，佐证有三的一般采用，佐证有二的反复辨析，孤证的一般舍弃。总之，慎之又慎。基于上述原则，此次修订，我们对提出商榷的几处史实，一一给予再辨析。其中，有两则需要向读者交代。

一则是关于西北根据地的游击区在陇东所含县份的问题。本书初版本采用的是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吴志渊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的观点，即在西北根据地游击区30个县中，属陇东境内的有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5个县。吴先生的依据是张志宏著的《陕北根据地概述》和《地名知识》1995年第2期第30页的记述。曾经长期在陕北生活和战斗过的陕北人吴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935年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统一之际，国民党已在陇东设置6县，即上述5县再加上镇原县。这6县以及固原、泾川、灵台3县均由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专员公署管辖。当时的陕甘边苏区陇东也建立了6个县，其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宁、新正、永红县，建立临时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是合水县。在创建苏区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要已建立独裁统治的国民党的地盘，一块一块地“赤化”过来，“赤化”过来的地方就叫根据地，是革命的战略依据。陇东苏区6县就是如此。这6县，除新正县部分地方和永红县大部属陕西旬邑县外，其余全包括在国民党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4县之中。所谓游击区，当然是苏区红军到国民党的地盘上去游击，必须以国民党的区划来界定。那么，为什么含环县而不含镇原县？这还得以事实来回答。在两块根据地统一之前，环县已经是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一个战场，而此时的镇原则相

4 | 陇东革命斗争史

对平静，国民党的势力还严密地控制着该县。在环县，一般性的不说，仅大的战斗就有1934年11月的红军长途奔袭曲子镇和1935年初的老爷岭上长达月余的巧布疑兵游击战（详见书中内容），陕甘边苏区两次反“围剿”斗争，环县都是其重要战场。当然，这与环县紧靠苏区这一地理位置有关。处在这一时期的镇原县，不能说没有斗争，但比较大的仅是1934年夏，平泉青年农民王子厚联络南三镇400余人，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而进行的抗捐抗税活动，尚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性质。王子厚变卖田产买枪开展革命斗争，其主要活动是在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南三镇之后，那时，西北根据地已经形成。鉴于以上事实，陇东游击区含环县而不含镇原县是对的，故不作修改。

另一则是关于陕甘宁边区所属陇东县份的问题。对初版本边区所属陇东仅含正宁、宁县、庆阳、合水4县的观点，看法不一。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早已众说纷纭。不仅在陇东这一块，有4县、5县、6县之说，连陕甘宁边区辖治，也有18县、23县、26县之说。吴志渊先生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认为在陇东是4县，本书初版本的依据在于此。但庆阳地委党史办编的《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概述》说：“国民党政府确认庆、合、镇、正、宁划归陕甘宁边区管辖。”这是含5县的观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甘肃近现代史》（第421页），庆阳地委党史办编的《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775页）、《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383页）和《陇东党的统战工作》（第21页），都说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镇原6县均被国民党承认划归在陕甘宁边区所管辖的23县之中。另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概述》和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陕甘宁边区

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两本书，都提出了陕甘宁边区经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通过辖治 26 县的观点，其中，含陇东 6 县、宁夏两县、陕西 18 县。同一问题答案何以差别若此？经过系统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国共两党在边区辖治问题上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所决定，或者说，这些观点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它们正好反映了这一相互斗争的过程。1937 年 7 月 17 日，国共两党在庐山谈判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 10 月 12 日召开第 333 次会议，其中关于陕甘宁边区辖治只确认了 18 个县，即陕西的肤施（延安）、甘泉、鄜（富）县、延长、安塞、安定（子长）、保安（志丹）、定边、靖边、淳化、枸（旬）邑、神府，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的盐池。1937 年 12 月（又一说为 1938 年 2 月），我党给国民党的签呈文件中，又提出将陕西的清涧、米脂、绥德、吴堡、葭（佳）县 5 县划归边区管辖，这样陕甘宁边区就辖治 23 县。后来，经边区政府呈请、蒋介石指定，又划出 3 个县为八路军“募补区”，实际上归属边区管辖。至此，陕甘宁边区辖治 26 县，即在原 23 县的基础上，增加了镇原、环县和豫旺县，陇东 6 县全包括在边区辖治之内。当然，以上这个演变过程是就大的线索而言的，有资料显示，其间尚有些小的调整，个别县的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总体上，边区 26 县、陇东 6 县的观点是不会错的。富有权威性的《文献卷上》那本书，尽管对边区所辖陕西县份的记述与其他史料略有不同，但还是边区 26 县、陇东 6 县。著者新近看到一份材料，其权威性更是不容置疑的。这份材料就是 1944 年 6 月由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发给中外记者的情况介绍《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该文有这样一段话：“1937 年，苏区自动改为特区，旋改名陕甘宁边区，……此时，边区所辖地区为：延安、延川、延长、清涧、

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神府（即神木、府谷两县各大部）、子长（即安定）、安塞、靖边、定边、志丹（即保安）、甘泉、富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豫旺、盐池等 26 县，面积 129000 余平方公里，人口 2000000。经蒋委员长指定与行政院第 333 次会议通过，为边区政府辖治及八路军募补区。”文中的“此时”，当指 1937 年及稍后一点时间，并非指介绍情况的 1944 年。因为，该文接着介绍了国民党对边区封锁包围和军事袭击情况，夺城占地之后，“边区现有人口 1480000，面积 99000 平方公里。为行政实施便利计，划为一市 30 县，5 个分区。”其中，“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等六个县”，“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陇东境内即有 8 个县。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边区辖治的变化情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陕甘宁边区的辖治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每次变化的结果当以届时的时间和条件为依据；其二，经蒋介石指定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在 1937 年 10 月到 1938 年这一段时间（即 1939 年春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军事“围剿”之前），边区辖治 26 县，所属陇东含 6 县的观点，不仅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且为多数材料所证明，显然是基本一致的看法。由此，在修订本书时我们采用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现在的庆阳地区各县（市），当年都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读者不曾提出意见的史实的修订，我们主要是对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情节或细节进一步校核，以使其更符合历史实际。这方面的改动最突出的要算王孝锡烈士就义时的一个细节和他的入党时间、入党介绍人这个情节了。关于王孝锡在刑车上一节，许多书籍、资料以至有相当权威的刊物，都记述为因

王孝锡不断高呼口号，被“刽子手用刀砍其臂，血溅丈余”云云。本书初版本采用了这个细节。但王干城编、王蓉生整理于1997年出版的《不废江河万古流——考证与辨析》一书，对此说提供了不同的资料。王老先生援引《甘肃文史资料》第13辑载张慎微《关于王孝锡烈士就义时一段细节的订正》一文的说法，以示读者。张文说：“当日早晨戒严，我正在三圣庙前（现在兰州武都路西段——著者）牛肉泡馍摊旁（距马路不过两三步），从炉后看见王孝锡囚车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门口，挣扎高呼‘共产党万岁’不止，囚车上的法警数人压不住，以带皮鞘鬼头刀平面甩在王的臂上（五花大绑），王呼口号遭打是实，法警并在王口中塞东西，这是当时实况。”王老先生还另举了清拔贡、时在兰州中学教书的宁县早胜人曹枢丞的所见，其情节和张慎微先生说法一致，是“王孝锡周围几个兵用鬼（鬼）头刀打他，……王孝锡奋力怒呼口号，头上冒气，大骂不止”。王干城老先生是王孝锡烈士之弟，他不以亲情而默认那个能展示敌人残暴、烈士不屈的众说细节，而另举事例以辨析，他的这种求实精神使我们相信被订正的细节的真实性，所以这次修订时我们更改了原文。关于王孝锡烈士的入党时间和入党介绍人，王干城老先生在他的那本书中，以五大理由长篇幅地说明是1925年而非1926年，是刘含初而非吕佑乾。限于文字，我们只略述其“理由之五”：据当时西安学生联合会主席兼陕西学生联合会主席王林（现名王芾南）回忆说：“1925年我去西北大学开党的会议时认识王孝锡的，那时王孝锡就是共产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不可能是吕佑乾，应是刘含初”。王老先生辨析道：“1924年王孝锡考入西北大学，在理科学习，这年秋共产党员刘含初来西北大学主持文科并任教授后，王孝锡即转入文科，申请理由是视力不好，学理科吃力，实际是为了更接近刘含初。

在王孝锡的遗物家信中，从1925年起就不再称刘含初为刘教授或刘含初先生，而改称含初同志或含初，不是党内同志不会这么亲切。”“吕佑乾是1925年10月吴化之（共产党员，当时负责团的工作——著者注）来西安后入党的，他（指王孝锡——著者注）入党当比吕佑乾早。”王老先生列举许多事实赞同王林观点后，反问道：“王孝锡入党介绍人为什么不由朝夕相处、了解最多最深的他的老师陕西人共产党员刘含初介绍，而由相距七八里路的省立‘第一中学校教员’河北人吕佑乾介绍呢？”这句话引号内“第一中学校教员”几个字，是王老先生引用所谓王孝锡《口供》中的原话，以挖苦《口供》伪造者的拙劣，其实吕佑乾当时是省立一中的训育主任。原来，王老先生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穿一个弥天大谎——王孝锡《口供》。他指出，由于刘含初、吕佑乾及陕西早期党的负责人魏野畴早已牺牲，而王孝锡又严守党的秘密，所以其入党耐间和入党介绍人是由清举人、民国初年曾任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的慕少堂著《甘宁青史略》所载王孝锡《口供》提供的，原话为：“十五年（指民国15年——著者注）在西安由陕西第一中学校教员吕佑乾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在西安活动。”王老先生颇费周折在甘肃省图书馆找到了这本野史（1936年由兰州俊华印书馆印）的原稿，发现作者对附录的所谓王孝锡《口供》涂、删、添、改竟达15处之多，由此写书予以驳斥，以正视听，还烈士以清白。书后还附了被涂改过的《口供》的复印件及许多证明材料。我们对此书作了反复研究，赞成王干城老先生的观点，据此也对本书初版本有关情节给予变更。

这次修订，我们还适当增补了一些内容。有增亦有删，但删的不多，删也是为了避免重复和更顺畅地增。陇东革命斗争的历史，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三五十万言的巨著，但是，为拉长篇

幅而增加文字，这不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这次的增补主要是对不该太简或疏漏的重大事实的充实和弥补。例如，关于有重要影响的陕甘边区特委的“七月决议”、在援西军中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影响、陇东各县辖区及沿革、陇东军分区部队的成长壮大及战绩等部分，都是如此。其中，有的在小节题目中给予另设，有的在内容中增添。另外，此次修订还增附了数幅地图，以便于读者阅读。应该说，修订本比初版本更充实一些。

本书所采用的度量衡单位，凡属史料所载的都保留原旧制单位不变，如：丈、亩、石、驮、斤、匹、里等；个别地方以新制（如公斤）为单位的，属编者的综合统计，特此说明。

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地感谢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的全体同志、庆阳地区各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组的所有成员、各种参考书籍的作者们以及热心帮助本书修订工作的朋友们。继续欢迎大家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不管本书会不会第三次印刷。如果初版本的读者们能读到这个修订本，我们该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可以使读者知道修订的原委，有助于阅读。请先看说明，再读正文——是为建议。

著者

二〇〇一年三月于西峰·兰州